

「『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』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會議紀要

陳佑慎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

蔣介石是重要歷史人物，更是國際性人物。蔣的內心思維、實際作為，久受各國學界關心。可惜的是，單一國家觀點長期限限制了研究視野；如何加強與周邊國家資料與詮釋的交流，從亞洲歷史及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待蔣，乃成為學界的努力目標。值此歷史研究趨於國際化之際，臺灣在民國政治史研究領域，包括蔣介石研究，猶有得天獨厚的地方。例如各史政機構的豐富館藏，以及學界與海外同行的較早接觸，都是有利條件。基此理由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「蔣介石研究群」鳩集臺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及世界各地學者，共同參與「敵乎？友乎？抗日反共政策之下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運作」研究計畫，以三年為期，定期舉辦研討會。2009年9月14至16日，假中研院近史所召開之「『蔣介石的權力網路及其政治運作』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為第一年年會會議。2010年9月4至5日，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之「『蔣介石的權力網路及其政治運作』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為第二年年會會議。2011年6月27至29日假中研院近史所召開之「『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』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即為第三年度之會議。

「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於2011年6月27日早，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開幕。開幕式由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主持，禮成，首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發表專題演講，題曰〈一宿雖有哭泣

晨起便必歡呼——蔣中正日記反映的「失敗文化」），鋪陳蔣介石在「失敗」且「屈辱」的世紀，如何不灰心地面對挑戰。事實上，公眾文化對失敗有不同的想法；如何詮釋成敗，每個人不盡相同。專題演講畢，進入大會討論議程。第一場討論會「蔣介石的決策思維」由山田辰雄主持。第一篇文章是吳景平發表之〈蔣介石與戰時國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制定與實施〉，強調中國金融史研究的必要性，並論析「個人」（蔣介石）在金融史的角色。吳景平認為，蔣介石戰時的若干金融舉措，有忽略金融規律之虞。第二篇文章為段瑞聰發表之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蔣介石的外交策略——以 1941 年為中心〉，認為蔣介石雖是軍人出身，但外交上有其遠見。耐人尋味的是，其間「民主」是手段而非目的，用以誘導美國。第三篇文章為楊奎松發表之〈蔣介石放棄外蒙之原因與經過（上）——以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考察〉，析論蔣介石的獨裁制度，如何造成 1945 年放棄外蒙的錯誤。蔣固有意維護領土主權，但日記上的內心想法與口頭聲言、實際舉措，常出現不一致。第四篇文章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發表之〈黨總裁治國：李宗仁赴美後蔣介石對黨國事務的經營〉，討論蔣介石於 1949 年「引退」後，以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對黨政軍大事的經營。例如，外交上在聯合國提出控蘇案；軍事上力圖經營中國東南與西南，東南的部分尚稱成功。惟「法統」始終是圍繞的問題。

第二場討論會「東亞視野之下的蔣介石」由張玉法主持。第一篇文章是黃自進發表之〈中日戰爭的前奏：蔣介石與華北問題（1933-1935）〉，指出對關東軍而言，最重要的是防衛蘇聯，華北形同戰略大後方。另一方面，同時期蔣介石的戰略重點是圍剿共軍，也不希望擴大華北問題。於是，蔣利用日方「皇道派」與「統治派」的衝突，曲折地確保中國主權。第二篇文章為王建朗之〈試論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戰後版圖構想的演變〉，謂隨著戰局趨於穩定，蔣介石始考慮版圖問題。當中，東北、臺灣、外蒙、琉球等地，因時間、性質不同，而有不同的結果；例如面臨蘇聯的野心，蔣對東北曾採取不放棄但擱置的策略。第三篇文章為吳啟訥發表之〈中華民族宗族論與邊疆自治實踐〉，指清朝、北洋、中共等政權皆承認民族的差異性，獨國民政府不然。蔣介石否認各民族存在「差異」，盡力弭平差異。無庸置疑地，這種思維方式有其歷史背景。

第三場討論會「蔣介石與地方政權」，由陳三井主持。第一篇文章為羅敏發表之〈蔣介石與 1932 年的汪、張交惡〉，詳述 1932 年汪精衛與張學良交惡的經緯，並論析該事件發生的時間點。其重要歷史背景是，責任內閣制的實行，以及蔣汪同樣反對對日絕交。惟蔣汪隔閡依舊存在。第二篇文章為家近亮子發表之〈蔣介石における一九三五年の分析——四川省建設と抗日戦の準備〉，指出 1935 年汪精衛辭職後的

權力真空，使蔣介石有機會施行政治指導。此後蔣開始重視四川建設，欲將之建設為模範省。第三篇文章是黃道炫發表之〈1935：國共在西南地區的纏鬥〉，認為1934年中共向西轉進的過程底蘊十分複雜，蔣介石曾有考慮網開一面的盤算。蔣日記顯示，共軍「三渡赤水」皆在他的掌握中。直到四渡赤水以後，紅軍始展現游龍戲水的一面。

第四場討論會「蔣介石的用人策略」，由黃克武主持。第一篇文章為張瑞德發表之〈侍從室與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（1937-1945）〉，剖述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及其評價，例如蔣著《中國之命運》沒有發揮它應有的影響力。在此當中，蔣介石之侍從室對於文藝社團的扶持，《大公報》的拉攏，是有意思的環節。第二篇文章為高田幸男發表之〈民國教育部的人員構成：1912-1947〉，從民國教育部正副長官、司處長，以及教育部官員集團（籍貫、年齡、男女）等要素進行分析。此課題涉及教育行政、官僚機構、知識分子人才流動等政治史、社會史相關問題，仍待深究。

6月27日的議程圓滿結束後，隔日進行第五場討論會「蔣介石權力網絡的組建」，由吳景平主持。第一篇文章為羅久蓉發表之〈近代中國情報機構的組織型態與業務開展〉，指出世界各國特情組織有其通性與殊性，惟各國各自依照社會條件、政治體制、文化傳統，仍有不同特質。為解讀1930至40年代間中國的相關發展，須放在

國共兩黨鬥爭的脈絡下，並涉及特務人員的忠誠與背叛的矛盾等問題思考。第二篇文章是岩谷將發表之〈蔣介石、共產黨、日本軍——20世紀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報組織の生成と展開〉，強調的是蔣介石政治地位之提升，出於蔣能確切掌握情報系統及特務組織。不惟如是，中共、日本特務系統，亦與國民黨特務系統交互作用。但國民黨特務系統的缺陷明顯，埋下在大陸失敗的遠因。第三篇文章是朱滋源發表之〈孫立人案的來龍與去脈：一九五零前後蔣中正父子改用政工重啟革命〉，鋪陳「孫立人案」的來龍去脈。蔣與孫立人爭執的表面重點，在於美國式、日本式、中國式或者蘇聯式改造國家的優劣之取捨。但骨子裡，則是對所謂「匪諜」的認定。思考相關問題，宜另闢蹊徑，改從治安之破壞或建設的觀點入手。

第六場討論會「蔣介石與日本」，由王建朗主持。第一篇文章為山田辰雄發表之〈蔣介石・記憶のなかの日本留学〉，透過蔣介石於1906年與1911年兩次留學日本的史料，分析日本帶給蔣的影響。蔣身為政治領袖，日本施諸他身上的影響，對其政治思想與政策的制訂，尤有密切關係。蔣的留學經過，與他記憶中的留學，皆是耐人尋味的課題。第二篇文章為戶部良一發表之〈日本軍人の蔣介石觀——日中戦争期の和平工作をめぐる〉，評析日本在戰時何以對蔣介石失望，轉向汪精衛。為探討相關問題，須留意日本軍人有所謂新舊「中國通」之

別。新中國通認為蔣挑起民族主義，凝聚個人權力，實行獨裁。舊中國通卻認為蔣當然要利用民族主義；若政權穩定，有助與蔣達成合作，雙方仍有空間。第三篇文章為松重充浩發表之〈日本『外地』における蒋介石認識の形成——滿洲事變前大連日本人社会を事例として〉，指出日本人對外國領袖的認識，乃是基於國家利益角度，來核定親疏關係。本文以大連日本居民為主，比較他們與日本本土居民認知上的差異。第四篇文章為川島真發表之〈第二次革命之後的蔣介石——1913年9月1日到6日〉，指出學界在分析蔣介石早期生活時，多依靠回憶性資料，間或使用日本外務省所藏史料。本文則盡量利用日本的地方史料，對蔣在二次革命後亡命日本的動向，作了研究上的補足。

第七場討論會「蔣介石的時代挑戰」，由松重充浩主持。第一篇文章是汪朝光發表之〈蔣介石與1947年國民政府的改組〉，從國民黨「以黨治國」的訓政體制出發，探析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的政治問題。特別是1947年國民政府的改組，涉及國民黨與青年黨、民社黨的反覆談商。第二篇文章為劉維開發表之〈憲政體制下的權力競逐——蔣中正在1948年的政治困境〉，亦以蔣介石在抗戰後面臨的政治變局切入。1947年底憲政體制的施行，對蔣在政府以及黨內的權威造成衝擊；本文即以立法院對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院長人選的介入，以及立法院正、副院長選舉等兩個主題探討之。第三篇文章

為楊天石發表之〈1946年政協會後關於憲草修改原則之爭〉，論析蔣介石對孫科參與制訂《憲草修改原則》的前罵後贊、《憲草修訂原則》與《五五憲草》的異同、國民黨內對憲草修改的反彈，以及當中涉及的中共、民盟、美國態度問題。

6月28日的最後一場討論會，是為「蔣介石的對蘇與對韓政策」，由唐啟華主持。第一篇文章是加藤陽子發表之〈日中戦争の裏面——対ソ開戦論の亡〉，論析1937年底日軍克南京後，日本近衛內閣何以一改積極求和的態度，反而宣布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」。作者認為，近衛內閣改變政策的主因是，值此對華戰役暫告段落之際，須防止陸軍參謀本部進一步發動對蘇戰爭。第二篇文章是裴京漢發表之〈中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對韓政策〉，聚焦蔣介石對重慶韓國臨時政府、韓半島問題的態度與政策。本文以晚近新公開的中英文史料，對過往研究進行批判性檢討。另外，蔣對戰後亞洲秩序的構想，亦屬耐人尋味的課題。

6月29日進行大會最後一天的議程。第九場討論會「蔣介石的政壇對手」，由汪朝光主持。第一篇文章是潘光哲發表之〈知識人對「新生活運動」的回應：以胡適為例〉，指出胡適對「新生活運動」有所批評，但不激烈。究其實質，胡適和蔣介石同樣以國族的自我批判為立論脈絡，但相較於蔣訴諸「傳統」，胡倡言的是「無為政治論」與「專家政治論」。兩人意識型態有別，但共

享同一種氣候，具體主張異途別趨。第二篇文章為陳紅民發表之〈蔣介石與胡適關係之再研究〉，評述蔣胡二人之間的「諍友」與私誼關係。就此而言，蔣對胡的不滿之處，因時而異：最早是因胡批評國民黨的「訓政體制」；胡任駐美大使後期，則是因其對美交涉工作不力；退臺初期，不滿胡之侈言「民主」、「自由」；胡適返臺後，則恨其對政策干涉太多。第三篇文章為王奇生發表之〈蔣介石與黨國元老（1925-1932）〉，論述國民黨後起之秀蔣介石，在孫中山逝世後，與「黨國元老」間的互動關係。蔣是「現實主義者」，對元老們不同的意見，即認為他們在政治上不知變通，且又堅持意識型態。第四篇文章為陳三井發表之〈蔣介石眼中的海外自由民主運動〉，探析大陸政權易手後，國共兩黨在香港進行的一場無形戰爭。當時一批反共，卻又不願追隨國民黨政府的知識份子、失意政客，在港高舉反共又追求自由民主。本文以國民黨視角出發，分析該黨如何以組織的力量去面對相關運動。

第十場討論會「國際處境的變化與外交決策的考量」，由深町英夫主持。第一篇文章是唐啟華發表之〈國民政府初期外交政策之演變，1925-1928〉，強調中國外交史研究的「革命史觀」，仍應反思。南京國民政府1928-1931年間的外交成就，應放在北洋到南京外交的傳承中來理解。南京外交是以「革命外交」之名，行「修約」之實，兩者具相當的連貫性。第二篇文章為鹿錫俊發表

之〈日独伊三国同盟をめぐる蔣介石の対応——中国指導者の内面から見た太平洋戦争への転換点〉，旨在於釐清抗戰中期的中國外交，包括對日、蘇、美、英、德等多方因素。例如蔣介石面對1940年日德義三國同盟的成立，何以起初採取中立政策？對相關問題的思考，須置於1939年歐戰爆發所牽引的國際政局脈絡下。第三篇文章為林孝庭發表之“Reconsidering Wartime U.S.-China Relations: Chiang Kai-shek, American Aid, and Domestic Politics, 1937-1945”，檢視中美兩國各自的政治生態、官員的內部分歧，對於兩國的暫時同盟有何影響？以史迪威（Joseph Warren Stilwell）問題為例，蔣的確不滿意史迪威，但在不同階段，史其實是被蔣、宋子文與羅斯福總統為不同目的消費與使用。

第十一場討論會「蔣介石的權力塑造」，由陳紅民主持。第一篇文章為橫山宏章發表之〈從中國革命的觀點探討個人崇拜與蔣介石的關係〉，論述蔣介石的神話地位如何塑造。西安事變爆發前的1936年10月31日，為蔣精心準備的一場祝壽典禮，頗可反映蔣個人崇拜的形成氛圍。本文透過《中央日報》、《申報》等媒體的報導，對相關問題進行解析。第二篇文章為深町英夫發表之〈南昌行營爭寵記：新生活運動的發軔與蔣介石的派系運作〉，指出國民黨內部派系的對立，影響著國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運動。以江西為例，黃埔系投入此一運動，

不無與控制省政府的政學系、CC系分庭抗禮之意。第三篇文章為黃克武發表之〈胡適、蔣介石與1950年代反共抗俄論的形成〉，梳理1949年到1958年間的蔣胡關係，這是兩人關係較融洽的時期。例如1951年胡適的一封長信，引發蔣撰寫《蘇俄在中國》的動機。蔣反共抗俄思想體系的形成，或受胡適影響甚大。第三篇文章為西村成雄發表之〈1946年民國政治：「制憲權力」合法性的流失〉，論析抗戰勝利前後國、共、民主黨派間的互動關係。從政治統治的合法性觀之，抗戰期間的國民參政會動搖了《訓政時期約法》建構的合法性，使國民黨逐漸流失了社會認同層面上的基礎。

最後一場討論會「蔣介石的政治挫敗與歷史轉機」，由西村成雄主持。第一篇文章為金以林發表之〈蔣介石三次下野比較研究〉，分別就三次下野期間黨內的壓力、各軍系的態度、蔣對下野的布置、蔣對下野的反思進行評述。例如第一次下野，蔣頗為無奈；及至第三次下野，主因是軍事困境，但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仍未多所撼動。第二篇文章為余敏玲發表之〈「偉大領袖」VS.「人民公敵」：從蔣介石形象的塑造看

國共宣傳戰，1945-1949〉，從民主與專制的標籤、建國願景、貪污報導、官民互動、宣傳、黨紀等面向，思考國共的宣傳戰。大抵而言，中共宣傳策略非常靈活，國民黨則更受儒家傳統影響。兩方差異影響彼此勢力的消長。

以上各場討論會，各國學者均熱烈參與討論。閉幕前的綜合討論，由黃克武、黃自進、山田辰雄、西村成雄、王健朗、王奇生主持。眾學者咸感本次會議多有新意，蔣介石研究，乃至於中國現代史研究，皆有學界可資開拓處。

總此而言，作為臺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及其它地區學者的合作，三年以來，第一年會議有24篇文章、第二年會議有21篇文章、本次會議則有37篇文章，參與學者共46人，總共106篇論文。學術上的突破處在於，擴大東亞視野的討論、激發不同文化擦撞下的新議題，不受傳統窠臼所限。目前，正就三年來的會議論文進行彙整，籌劃論文集之出版，預計年內出版繁體、簡體中文版，明年接續推出日文版。相關研究成果，對於東亞地區的中國現代史研究，允有可觀影響。